

八旗制度与 满族文化



沈阳故宫学术

支运亭 主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沈阳故宫学术论丛

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

支运亭 主



辽宁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八旗制度与满族文化/支运亭主编.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2. 3

(沈阳故宫学术论丛)

ISBN 7 - 80644 - 589 - 7

I. 八… II. 支… III. ①八旗制度—研究—文集
②满族—民族文化—研究—文集 IV. ①D691.2 - 53
②K282.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4997 号

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阜新市印刷总厂印刷

字数: 260 千字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1/8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责任校对: 张启发

封面设计: 杜 江

王新明

印数: 1—2100

定价: 28.00 元

目 录

满族历史胜迹的世纪沧桑	
——沈阳故宫百年史话	支运亭/1
满洲八旗定制考析	阎崇年/35
美国与台湾学者近年来对满族史与八旗制度	
史的研究简述	定宜庄/50
近年来日本的八旗问题研究综述	刘小萌/57
八旗与八旗子弟	赵志强/74
清代八旗管领与“辛者库”问题	杜家骥/89
雍正皇帝整饬旗务述论	佟永功 关嘉禄/115
关于沈阳“三韩山斗碑”的考察	张玉兴/128
辽宁省档案馆藏《世管佐领及世职承袭谱档》	
.....	沈 微 唐英凯/139
论八旗中的民族关系	张佳生/148
清代八旗满蒙科举世家述论	张 杰/157
关于天聪五年正月蒙古文信牌	李勤璞/167
有关牛录八旗制度创建时间等问题的再认识	姜相顺/180
简论清初诸帝对八旗的思想统治	唐英凯/184
清入关前八旗官制三题	佟 悦/208
评努尔哈赤初创八旗的社会基础	白洪希/219
陪都盛京旗人成分考述	
——兼论盛京八旗驻防的重建	陆海英/234

简论八旗制度与满族的形成	张爱群/247
浅谈清初八旗中的朝鲜族成分	李贤淑/258
清初八旗方位与阴阳五行学说	孙启仁/271
刍议雍正朝的“八旗生计”	李兴华/282
八旗制度产生之蠡测	王艳春/293
关于辽宁省图书馆藏清内府刻满文图书	卢秀丽/303
附录:二十世纪国内研究沈阳故宫论文简目	333

满族历史胜迹的世纪沧桑

——沈阳故宫百年史话

支运亭

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社会发展朝着历史人文科学不断进步的时刻，我作为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史学工作者、文物工作者，在建院 75 周年之际，回首异常钟爱的这座关外紫禁城的百年往事感慨良多。在这跨世纪的时刻，在使命感的驱使下欣然命笔，抚今追昔诉说沈阳故宫一个世纪的变迁，以示后人。

沈阳故宫是中国国内与北京故宫比肩仅存的两座古代帝王宫殿建筑群。历史上清朝“肇兴东土”，盛京为“隆兴之区”、“丰沛故里”。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在此创业拓基，清世祖在此“往定中原”。盛京大内为“列圣陟降”之地，故受清朝诸帝隆宠。始有四帝十次东巡谒陵之举，随有大政殿前站班之制、列帝奉册宝实录之藏。这座巍巍金阙玉殿之著称是为清宫三大官藏之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收藏而闻名于世。道光朝之后，清室腐败衰微，列强入侵，内忧外患齐至，肇兴之区饱受涂炭。20 世纪前半叶的这座皇家宫阙遍体鳞伤，迈着一步一蹶的蹒跚步伐艰难地前行。20 世纪的后半叶她获得了新生，由过去封闭的皇家禁地变为向人民开放的历史、文化教育基地，成为博采广

收综汇万物，佐读书之不足以广其识的宣传教育机构，使专家、学者、广大观众有机会考察、研究这些古代建筑的经典及深藏大内宫阙的文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沈阳故宫更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关注的重要文化遗产。本文仅对清末以后百年沈阳故宫的变迁情况作一综述，谬误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清末民初深受劫难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卑躬屈膝丧权失地，隆兴之地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至民国初年，宫殿的支配权掌握在军阀与政府之手。藏品外流，建筑被毁，盛京皇宫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中日甲午之战后，沙俄借机于1900年9月占领海城、牛庄、辽阳后，逼近盛京城。由于盛京将军增祺、副都统晋昌弃城逃跑，俄军入城后首先占领了皇宫和盛京衙门等重要官署。据美国人乔治·亚历山大伦森在《俄中战争——义和团运动时期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战争》一书中介绍，1900年10月1日这天“太阳西落时，库沙科夫的步兵来到，占领了炮台的八面门和皇城的内墙。哥萨克兵负责守卫宫殿，突击队和巡逻队守卫盛京将军官邸。”就这样历来是宫阙禁地的盛京皇宫第一次丧失了尊严，置于沙俄侵略军的控制之下。后经清政府一再要求和多方面的压力，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十一日俄军才最后撤出盛京皇宫，交清朝盛京官员接收，先后占领达两年半之久，使这座宫殿及其藏品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俄兵撤出之后，盛京内务府官员对翔凤阁、东西七间楼、敬典阁、崇谟阁、太庙等处的藏品进行了详细的清点。统计清点结果，在此期间宫内丢失和损坏的藏品达万件以上。按光绪二十九年《盛京宫殿行宫楼阁缺

失陈设器物清册》所记，“翔凤阁缺失各宫殿陈设并库存器物金银器等项”，共缺失各种器物3 000多件，大小银锭8 000个，共重6 000两。各种金器、金锭、金条等总计重达万两以上。此外“东七间楼缺失各项瓷器”共6 300多件，“西七间楼缺失书籍墨刻等项”共540多件（部）。除各楼阁所藏物品外，盛京宫内“供奉”和尊藏的清历朝帝后玉册、玉宝、玉牒、实录等亦有丢失。由此可见，盛京宫内各库无一幸免，藏品均遭俄军劫掠破坏。

沙俄军队占据期间的严重破坏，使盛京皇宫元气大伤。这不仅是因为缺失了大量的宫廷藏品，更重要的是这一事实表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大清王朝，不但主权、领土受到洋人的干涉和侵占，连皇家的“陪都宫殿”也难以维持“禁地”尊严。

二、日俄战争时期饱受涂炭

为了与沙俄争夺势力范围，1904年，日本在英、美的支持下发动了日俄战争，两只争食的恶狗在中国的土地上展开厮杀。腐败透顶的清政府不但不采取任何保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措施，反而卑鄙无耻地宣布“严守中立”，划辽河以东为战区，听凭日俄军队在我国领土上任意蹂躏中国人民。

在战争之初，清廷即以提出交战双方不得扰动其“祖宗山陵宫殿”为条件，但俄日军队根本不听，置若罔闻。俄军不仅险些放火烧掉福陵，而且其海军陆战队等还曾闯入盛京宫殿，在大政殿前摄影留念，以示横行皇宫之“荣耀”。1905年春，经“奉天会战”之后，日本在陆路的胜局已定，并控制了盛京周围地区。日本政府早已闻知盛京皇宫是藏珍蓄宝之所，不仅有大量的御用珍玩，还有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因此便欲乘机攫取这些

秘藏史料。该年4月，日本人内藤虎次郎来沈。该人字炳卿，号湖南，出身自日本南部藩鹿角郡的一个儒教家庭，自幼学习汉文化，1885年于秋田师范学校毕业后，初从教职，后转入新闻界任记者编辑工作。他以“随军新闻记者”的公开身份，受日本外务省派遣到盛京“调查”政务现状和清初学术资料。他借助于日军获胜后的淫威逼迫清朝盛京官员同意，进入了盛京皇宫。

内藤进入盛京皇宫后，不仅查看了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还在崇谟阁和西七间楼看到了《满洲实录图》、《满文老档》、《汉文旧档》以及《蒙古源流》、《五体清文鉴》等鲜为外界所知的重要史料。本来清代崇谟阁所藏皆为“皇家秘籍”，除盛京内务府有关管理人员外，他人一概不得入内，更谈不上任意翻阅了。然而，这些“金匱石室之藏”却被内藤这样一个日本记者窥知详细，而且还允许他将《汉文旧档》6册全部晒蓝制版携归。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洋人奴颜婢膝的丑态。崇谟阁内的《汉文旧档》系太宗年间故物，有清一代关于它的详情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叙及崇谟阁藏品的书籍以及文溯阁清册中，提到此档时均只“旧档案一匣”，对其内容则不涉一语，盖因无从得见之故。内藤此次将《汉文旧档》全部复制，遂被认为是发现这部分史料的第一人。此外，内藤还拍摄了宫内所藏《蒙古源流》的蒙文部分，又在日本宫内大臣田中光显的指使下，与当时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合谋，由军方出面，强行压价购去盛京黄寺（实胜寺）收藏的明代蒙文佛经中的珍品——《金字蒙古文藏经》。后来内藤虎次郎还曾于民国初年再次入盛京皇宫拍摄《满文老档》等史料。

日俄战争后，清政府面临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为进一步欺骗和麻痹人民，玩弄起假“维新”和“筹备立宪”的花招。在东北地区除推行练新军、办警察、废科举、兴实业等措施外，

还于光绪三十三年间（1907年）实行所谓“东三省改制”，以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又于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盛京的“陪都”规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甲辰进士、杭州驻防满洲旗人金梁（息侯），出任奉天旗务处总办兼管盛京内务府事务。

这时的盛京皇宫更是每况愈下，宫禁日开，藏品不断外流。较为突出的一个现象是，宫殿藏品每每被调运北京或奉旨馈赠外人。另据金梁记述，光绪三十四年他来盛京后，有一唐姓专使奉命出使美国，行前特意路过盛京，从宫殿所藏瓷器中选取佳品数件携之西行，说是以备赠送彼国国主之用。更有甚者，清廷竟允许外国人到宫殿内自行选取物品携出。

1909年有一曾任埃及元帅的英国将军希吉纳，老而鳏居，酷嗜中国瓷器。自谓“视兵如子，以瓷为妻”，尝闻盛京皇宫多贮佳瓷。到北京后即向任监国摄政王的载沣提出要求，欲至盛京一览。结果不仅获特旨允准，清廷还电谕盛京方面允许此人自选佳瓷两件为赠。金梁等人接电后甚感为难，恐任其挑选会将大器精品选中，遂事先将东七间楼瓷器库中大且精者百十件移贮他处。希吉纳入库挑选，对楼内所陈瓷器一览无余。随即询问：尚有佳者藏于何处？金梁回答：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不料希吉纳拿出随身携带的一些照片向金梁指问，照片所摄大多为事先移出的瓷器精品，金梁等只得答以不知。希吉纳无奈，从中挑选4件。由于多拿了两件，金梁等与希吉纳同见东三省总督锡良，要求锡良定夺。锡良怕因两件瓷器得罪了洋人，结果还是同意将此4件赠与希吉纳。

三、从陪都宫殿的“皇家产业”到博物馆

宣统二年（1910年）东三省总督锡良根据金梁等人为了不使国宝继续被洋人窃走的建议，拟于盛京大内文溯阁前建设博览馆，将殿阁恭贮器物酌移陈列，以肃观瞻。奏折全文照录如下：

窃我朝肇兴东土，盛京大内为列圣陟降之地。宫墙美富，禁筑森严，飞龙、翔凤二阁恭储御用器物、珍宝、图籍，尊藏整齐，而文溯阁《四库全书》尤为完善。内府禁地封鐻守护向称严肃。迩以交通便利，外宾来游，神丽阙廷，咸殷瞻仰。圣朝方欲慰海内观光之望，示王者无外之义，灵台灵治与众同乐，正足以广皇仁而昭盛概。

伏查上年学部筹建京师图书馆，奏请赏给热河行宫文津阁藏书及各殿座陈设书籍。又本年浙江抚臣奏请于西湖行宫文澜阁旁空地建设图书馆，先后奉旨俞允在案。臣拟请援照于盛京大内文溯阁前隙地建设博览馆，敬将殿阁恭储诸器物分别移置其中，厘定规章纵人观览。其余殿阁尊藏仍旧封锁，不得任人启视，以昭诚敬。

查东西各国多设有皇室博览馆，专储皇室传用物件，谓足以示皇室之尊严而发国民之忠爱。臣今请设盛京大内博览馆用意正同，如蒙天恩俯如所请，当即由臣选派委员敬谨筹办。一俟该馆成立，所有应行移储物件仍当另行开具清单奏明办理，以昭郑重。

所有请设盛京大内博览馆缘由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

此奏折中对于建立盛京大内博览馆条件和理由的陈述较为中肯。既随时代潮流兴办博物馆之业，又不影响皇室的尊严。但当时清廷不知是虑及祖宗宫殿的名分，还是在风雨飘摇的困境中无

心顾及，并未允准。此后不到一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昔日供人瞻仰的盛京宫阙，成为地地道道的“前朝遗迹”了。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推翻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但是，由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清朝的皇室并没有被马上赶下历史舞台。根据清室优待条件的规定，清帝宣布退位后，仍然保持其皇帝“尊号”，并可继续在紫禁城内廷居住，其原有之私产由民国政府特别保护。这就使以溥仪为核心的逊清小朝廷，仍然盘踞在北京皇宫内廷，在极为有限的范围里行使残存的“皇权”。盛京宫殿仍如清末一样归内务府办事处管理，且办事处下仍设有广储、营造司等旧时机构，这真可谓“江山易主，执掌依旧”。

至1915年6月，奉天地方皇室事务较清代已大为减少，盛京内务府下属办事机构进行了改组。将原所设各司及多余人员裁撤，处下只设文牍、会计、守卫3科，共置科长3人、科员10人、守卫长1人、书记8人、兵役18人，办事处仍由坐办、帮办、会办等官员主持其事。1921年，此办事处又改称“筹办皇产事宜处”，由总办、会办掌其事，人员设置基本未变。改组后的内务府办事处，除负责一些尚属逊清皇室的房屋、地产的经管外，主要职责是管理和守卫奉天宫殿。

然而，此时内务府对奉天宫殿的管理已非清朝覆亡前可比，有关宫殿事务的处理，往往决定于北洋政府或地方政府，民国官员可以随便从宫中提取文物。时任奉天都督的张作霖，曾派人从七间楼瓷器库中提出“霁红小高瓶”、“冬青釉带盖高罐”、“冬青釉蒜头口大肚瓶”等精制瓷器数件。至于一些外国人，只需经外交部奉天交涉署与内务府办事处联系，即可入宫观瞻，并堂而皇之地从事有关“考察”、“研究”活动。日本人内藤虎次郎

乘清、民之交宫内管理较为松弛之际再度来到奉天，请示拍摄崇谟阁《满文老档》的照片，未获允许，复改以拍摄《五体清文鉴》照片的名义进入宫殿。结果除拍下《五体清文鉴》全书共5 000多张底片外，又偷将《满文老档》全文拍摄底片4 000多张，并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中的部分珍本抄录下来，悉数携归日本。就这样，内藤用欺骗和威吓等手段，从奉天故宫再次攫得珍贵的清代文献史料。后来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便是根据这次盗拍的底片译出的。

1924年7月，日本满铁工业专门学校助教伊藤清造，率该校建设科建筑分科学生9人，以考察研究中国旧建筑及旧装饰为由，要求进入宫殿绘图拍照。经日本奉天满铁公所与奉天交涉署联系，内务府皇产事宜处同意他们到故宫考察三星期。结果伊藤等将各主要宫殿建筑均作了测量，并绘制了平面图和细部结构图，又拍摄了百余张照片，获得了有关盛京宫殿建筑的资料和数据。后来伊藤清造据此编著《奉天宫殿之研究》、《奉天宫殿建筑图集》等书籍。此外尚有英美烟草公司广告部拍摄故宫景致电影片等。总之，民国初期奉天故宫虽作为皇室产业由内务府管理，但一些外国人出于各种目的，以各种手段，获取了诸多有关皇宫藏品和宫殿建筑等方面的宝贵资料。1914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呈文经大总统袁世凯批准，决定于北京故宫“外朝”部分（乾清门以南）建立“古物陈列所”，归属内务部（后称“内政部”）领导。遂议定将奉天故宫和热河行宫所藏清代宫廷物品运至北京，以敷陈列之用。是年3月，奉天宫殿藏品115 199件运抵北京。同年10月从中选择部分精品于文华、武英、太和、中和、保和等殿内陈列就绪公开展览。次年奉天文溯阁所藏《四库全书》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亦被运至北京，置于保和殿等处，仍归古物陈列所。

民国初年的这次文物外运，无疑是沈阳故宫的一场“浩劫”。原藏的各宫陈设物品、御用珍宝、宋元明清书画、古铜鼎彝、御用武备及明清瓷器等共 11 万余件几乎被运一空。西七间楼藏殿版图书也有一部分被同时运走。此时之故宫与自清中叶以来，素以贮藏宫廷文物丰富著称的昔日盛京皇宫洋洋十余万件藏品真是无法相比。1924 年 11 月 4 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条件中规定：“大清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即日移出宫禁，其一切皇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等。1925 年春奉天省政府正式接收了盛京内务府皇产事宜处管理的宫殿及藏品。中华民国成立 14 年后，盛京皇产才归民国政府执掌管理，这是它兴建 300 年来的历史转折。惟一得以侥幸的是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回归。1925 年，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赴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参观古物陈列所时，在保和殿内看到了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当时正值奉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获胜，北京政局处于奉系控制之下。冯广民等欲乘机将全书运回，遂赴天津求助于张学良、杨宇霆，又至北京求助于农商总长莫德惠和古物陈列所会办梁玉书等，得诸人赞同，旋经内阁会议通过，允许将书运回。冯广民等又邀集奉人旅京者 30 余人，用了 8 天时间将全书检收包装。于 8 月 7 日运回沈阳，时被视为东三省文化界一大喜事。全书运回后，因文溯阁时为军队所占，且其建筑亦需修缮，故暂存于沈阳城内文庙（时为省教育会会址）。经教育会呈请省政府同意，组成“文溯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又于 1926 年 6 月至 9 月，对文溯阁加以整修，1927 年初才复将全书入藏阁中，结束了十余年来“书阁分离”的历史。其他一些宫殿则主要为当地军队和奉天省政府占用，奉天省教育会因原会场狭小搬入西宫并占据了嘉荫堂、戏台等处，文溯阁一

路亦被教育会所占据。东宫颐和殿等处则被奉天省法学研究会用为会址。大清门南朝房一区于1925年左右被东北长途电话局占用，并在这里另建新楼，昔日皇宫面目全非。总之，奉天省政府接收故宫前后，这里简直像一个“大杂院”，而且院内“居民”往往对所占古代建筑保护不足，破坏有余。经过清末民初15年的磨难，至本世纪20年代中期，昔日庄严肃穆、藏珍蓄宝的盛京皇宫，已是满目疮痍，珍藏寥寥。

清朝末年，金梁曾提出在盛京大内设立皇室博览馆的建议，终未能得到清廷允准。1925年沈阳故宫由地方政府接管后，再作为“皇家禁地”加以守护已不可能，怎样利用这处宫殿建筑群便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从当时的一些档案材料分析，奉天省政府接收故宫之初并未准备立刻着手建立博物馆，只是将一部分较有价值的宫廷文物挑选出来运至省公署保存。1925年10月10日，政府接收后的北京故宫“内廷”部分辟为“故宫博物院”，这一事件对决定沈阳故宫的使用无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于是，在这里筹建博物馆也很快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26年冬，经当时的奉天省省长莫德惠提议并由省议会通过决议，为“搜存古物，阐扬文化”，定于沈阳故宫内设立“东三省博物馆”。经过一番准备于11月16日正式成立了“东三省博物馆筹办处”，委任前国会议员仇玉珽为馆长，其下设管理、文牍、会计、庶务四股，正式开始筹办工作。当时故宫东、西两路和中路的东、西宫分别为外界所占用，大清门南朝房区和太庙亦不属博物馆管理，故东三省博物馆的馆舍实际上只有大清门至清宁宫一线的几座宫殿。

博物馆成立之初，因故宫建筑已多年失修，接收的各宫殿内外多有残破污旧之处；且可供陈设展览的物品亦极为有限，故筹办工作的当务之急便是整修宫殿和征集藏品。各宫殿装饰的第一

步是室内裱糊，历时两月有余，对崇政殿、翔凤阁、飞龙阁、霞绮楼、日华楼、左翊门、右翊门、协中斋、师善斋、永福宫、关雎宫、衍庆宫、麟趾宫、东配宫、西配宫、清宁宫及凤凰楼下层等17处共87间房屋均已裱糊竣工。上述工程虽非全面修缮，只是对各宫殿施以裱糊、油饰等表面修整，但毕竟为日后陈列展览提供了可敷应用的场所。

东三省博物馆经过一年多的筹办，除对馆舍各宫殿进行了一些修整外，其他方面并无明显进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费短缺，陈列物品不足。1928年春，归国不久的著名女画家杨令菲来沈阳任教。奉天省省长莫德惠便托人与她相商，请她为博物馆复制一批历代帝王画像以供陈列展览之用。由杨女士自备纸张颜料并负责装裱，博物馆付给她一定的工料费报酬。商定之后，杨令菲女士即赴北京故宫文华殿（时属古物陈列所），按殿内所悬帝王像原图精心临摹。至年底事竣，共绘制了自三皇五帝迄明朝历代帝王（后）画像96幅。次年5月，当杨女士所绘的一部分帝王像交付博物馆筹办处后，该馆曾举办了一次公开展览。

这次临时性展览主要是筹集经费，尚非博物馆正式开放。展览自5月5日起共举办了6天，出乎预料的是观众异常踊跃，多达10万人次以上，这在当时仅有100多万人口的沈阳城可谓盛况空前。此间固然有人们欲一睹历代帝王风采的因素，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盛京皇宫300年来首次对公众开放。昔日只能在红墙之外翘首而望，如今谁不想亲临“宫闱禁地”一饱眼福呢。由此可见盛京皇宫对人们还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

正当博物馆筹备工作略有起色之际，国内政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928年5月，奉系军阀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组成的联军进攻下节节败退，最后不得不由关内撤回东北。沈阳为奉系军阀大本营所在地，退回的军队大批涌入城内，

其中一些便进入宫殿内驻扎，东三省博物馆的部分馆舍亦被部队所占，筹办事务无法正常进行。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日军炸死，东北局势更趋紧张。此后几个月内博物馆的筹办工作几乎完全陷于停顿状态。现存奉天省公署档案中，有一份是年9月省教育会的呈文，此文为呈请省政府将凤凰楼及迤北清宁宫等宫殿拨归教育会，以供组织“教育俱乐部”之用，内称：当时凤凰楼及台上诸宫被陆军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第19师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本部占用，难免有所损坏，故请拨予教育会使用，并说凤凰楼迤南房间足敷博物馆陈列物品及办公所用等。虽然省府并未同意教育会所提要求，但博物馆的数十间宫殿与博物馆陈列室被军队所占，筹备工作基本陷于停滞的不景气状况。

东三省博物馆自1926年11月开始筹办至1928年冬，虽然经历了整整两年的时间，但进展速度却相当迟缓，距成为较正规的博物馆尚有相当大的距离。直到1928年末至翌年初实行改组后，才有了起色并得到较快的发展。

1928年奉天省公署与军方交涉，获张学良将军支持，不久将大部分被占宫殿即归还博物馆。省府认为已经筹办两年的原东三省博物馆“规制未宏，应行扩充”，遂命省教育厅长王毓桂、沈阳市长李德新、省教育会长冯广民及仇玉珽、李象庚、戴裕忱等人共同组成筹备委员会，在原东三省博物馆的筹办基础上，重新筹备建立历史博物馆及图书馆。同时决定筹备工作宜先从检查盛京皇宫遗存物品入手，并由省府委派参议王家瑞会同各委员着手查点。是年12月，奉天省省长翟文选发出聘书，请清末曾于沈阳故宫兼管诸事的金梁担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金氏曾在逊清皇宫任过“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职，逊帝出宫后不久，他又重来沈阳。翟文选所致聘书中誉其为“博物君子、考订专家，论史则笔擅三长，稽古则学邃六一”。金梁在此20年前便有筹办